

加拿大自由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探析

马 颖

六年前自由党在加拿大全国大选中击败了执政达九年的进步保守党,组成了以让·克里蒂安为首的自由党政府。这届政府自登台以来,推行削减财政赤字和促进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对战后以来逐步形成的社会福利体系进行了全面的“结构性改革”,由此带来了本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使加拿大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或居于发达国家“七强”之首位,或居于前列。

本文拟就自由党上台前加拿大的经济形势、自由党政府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政策成效及前景等问题作一探析。

—

自由党政府上台之前,加拿大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整个经济呈现出严重失衡的病态特征,宏观经济运行发生了严重的紊乱。这种状况可以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上看起来。

1. 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庞大的欠债规模

1993 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 420 亿加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5.9%,而包括联邦和 10 省两地区在内的政府部门赤字总额为 660 亿加元。在西方“七强”中,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仅次于意大利居第二位。与赤字规模相联系的是公债规模。1993-1994 财政年度,仅联邦政府公债对 GDP 的比率就达到了 71%,而加拿大三级政府的债务总额更是惊人,高达 6612 亿加元,三级政府的公债对 GDP 比率达到 93%。这一比率在“七强”中也是仅次于意大利居第二。据加拿大统计局计算,如此高的政府部门公债总额意味着 1994 年每个加拿大人所承受的负债额为 23065 加元。1993-1994 财政年度,每一个加元的税收中有 33 加分用于支付公债利息,而在十年前只有 11 加分。加拿大的公债总额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呈加速攀升的势头,自 1981-1982 财政年度到 1992-1993 财政年度竟猛增 250%;同期内加拿大人均负债额翻了 5 番,由 4339 加元增加到 23065 加元。

2. 高失业率和低增长率

1993 年秋正值自由党登台执掌权柄之际,加拿大的失业率为 11.4%,在“七强”中仅次于法国居第二位。从 1990-1991 年经济衰退以来,失业率由 1990 年的 81.9% 上升为 1993 年的 11.4%。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使许多加拿大人生活难以为继,只好动用“已注册退休储蓄计划”资金。据加拿大统计局透露,仅 1991 年就有 50 多万 65 岁退休年龄以下的加拿

大人动用了这一计划下的资金,金额达 32 亿加元,其中约有 16 亿加元是由年龄在 45 岁甚至更年轻的加拿大人取走的。许多人是因为用完了失业保险救济金或是根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才动用这笔资金的。联合国有关机构在一份报告中尖锐地批评加拿大政府“听任贫困和失业在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持续存在下去”,认为加拿大政府“在过去 10 年内在缓解贫困方面似乎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进步”。这一批评虽然显得过激,但毕竟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加拿大一直没有摆脱 1990-1991 年衰退以来经济低速增长的局面,实际 GDP 没有增长,在整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加拿大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不到 1%,同期内多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七强”中是最低的。

3. 经常帐户长期赤字和加元处于弱势地位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加拿大经常帐户赤字一直保持较大规模,相当于 GDP 的近 3%。在五六十年来,加拿大的经常帐户赤字往往是由国内强劲投资所引起,而八九十年代则常常是因政府长期赤字融资所致。与此同时,加元长期趋弱。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加元持续下滑,从 1976 年 6 月 1 加元兑换 1.04 美元降至 1986 年 2 月仅兑换 69.13 美分的历史低点。1986 至 1991 年间,加拿大货币当局为抑制通货膨胀曾大举提高利率,使 1 加元能互换到 89 美分,但自美国摆脱经济衰退后出现经济强劲复苏以来,加美两国间利差缩小,加元再度趋弱。引起加元长期疲软的因素主要同宏观经济环境有关。联邦政府迫于财政压力频频向外举债。据统计 1993 年的债务总额中,外债竟高达 5880 亿加元。联邦政府对国外储蓄的长期依赖,扩大了经常帐户赤字,进而迫使加元贬值。

1993 年初加拿大大选拉开帷幕,在野的自由党频频发动攻势。该党领袖让·克雷蒂安提出了“10 点计划”的竞选纲领,内容包括创造就业机会,鼓励在职培训,逐步削减赤字,促进技术开发,投资于国民教育,在解决紧迫的经济问题的同时实行全面改革。相形之下,进步保守党在竞选中处于守势。该党自 1984 年秋执政以来,虽然在战胜通货膨胀方面成就斐然,并采用高利率政策而使加元趋于坚挺,但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是财政赤字和公债持续上升,经济增长缓慢和失业率高居不下甚至仍在上升。此外,广泛征收商品和服务税(GST,即销售税),利用该党在两院中的多数席位,置有关环境与劳保标准的条款对本国不利而不顾,抢在美、墨之前强行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引起人们普遍不满;在 1990-1991 年经济危机中

政府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加上未能扼制住魁北克分裂主义的挑战而最终酿成了两次宪法危机,更使得马尔罗尼政府的威望一落千丈。1993年6月马尔罗尼引咎辞职之后,新继任的女首相金·坎贝尔自上台伊始就表现出缺乏政治经验,对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及竞选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在她提出的竞选纲领中,强调削减赤字,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调整经济结构和促进自由贸易,但唯独不提增加就业,并在公开场合暗示高失业率将延续到世纪末。当舆论指出坎贝尔并未给出实现削减赤字的细节时,她却公开承认,要想消灭赤字是困难的,她代表进步保守党提出的只不过是“先试着干”的有待修正的草案;当有传闻说如果她的政府有望继续执政的话将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时,对此,坎贝尔起先矢口否认,不久又改口说她的政府只想修改福利计划,而不是削减这一计划。相反,以让·克雷蒂安为首的自由党在竞选中一再承诺,若该党当选将通过公共工程计划和社区青年服务来增加就业,鼓励在职培训和企业的研究与开发,但回避销售税和社会福利计划等敏感问题,致使自由党在竞选中连连得手。到了1993年秋形势急转直下,进步保守党一再失手,选民纷纷倒向自由党,竞选最后以自由党获胜而告终。

二

自由党上台之后广泛征询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学家们的政策建议,同各省省长反复磋商并就主要政策方案取得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份削减财政赤字,降低公债规模,改革社会福利计划,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既治标又治本的政策纲领。自由党政府认为,要整治宏观经济环境,关键是要理顺财政;理顺政府财政有助于降低利率,通过低利率和已经很低的通货膨胀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反过来高经济增长率和高就业率又将通过高税收进一步改进财政状况。这一具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色彩的政策纲领正如联邦财政部长保罗·马丁所言,它体现的是“双轨式”政策思路:首先是削减支出;然后将政府资源集中在能使国内潜力达到最大化的那些领域,以创造就业和实现经济增长。正是基于这一点,自由党政府避免走前任进步保守党政府以大幅度增税来削减财政赤字的老路,尽量少增税或不提高个人税率,尽可能寻找非税收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在财政状况明显改善的前提下,再实行大规模减免税,以促进经济增长。实践表明,自由党政府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效果。

1. 理顺财政收支,降低公债规模

自由党政府为了实现平衡财政收支以便为私人部门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千方百计地在缩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收入和减轻公债压力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在缩减开支方面,在1994年初提交的第一个预算中,军费支出,对外援助以及对失业津贴的支出均被削减,公职人员薪水也被“冻结”三年不增加。随后1995-1996年和1996-1997两个年度的预算中,又引入了计划复审机制,对联邦政府各部门支出进行全面复审,以降低支出和提高效率。计划复审机制不仅降低了支出,而且将支出配置到最需要的领域,使联邦政府计划支出占GDP的比率降至12.7%,达到1949-1950财政年度以来的最低水

平。自由党政府还收紧了在财政稳定计划下支付给付金的条件,宣布今后唯有当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时才向有关省份支付给付金。此外,自1998-1999年度起,自由党政府削减了对企业的补贴达61%。以后除继续保留对农业的直接生产补贴外,对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的资助将按照商业化原则,以同私人部门共同分担风险或贷款方式进行。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自由党政府兼用了税收与非税收手段。税收手段包括提高营业税和汽油税,降低甚至取消对高收入老年人的税收减免优惠,取消一定额度内对资本利得的终身减免优惠以及对私人公司的优惠税率等。非税收手段包括将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the 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s)的全部股份和加拿大石油公司(Petro-Canada)的大部分股份出售给私人,将空中导航系统(Air Navigation System)直接售给私人,等等。仅非税收措施就使联邦政府的收入一次性增加32亿加元。在降低公债规模方面,自由党政府拟定了一套债务偿还计划,其内容除平衡预算之外,还包括将1995-1996和1996-1997两个财政年度的财政计划建立在谨慎的经济假设基础之上,并设立应急储备金。“谨慎的经济假设”是自由党上台不久在征询社会各界政策建议的圆桌会议上由经济学家们提出来,并经众议院财政委员会推荐而被采纳的。其主要内容是把预算计划建立在假设利率高于私人部门预测的平均水平的基础上,以便在计算名义GDP时留有余地,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时联邦政府偏离削减赤字和偿还公债目标的可能性。“应急储备金”则是为了防备在对财政预算作出计划时不可避免的不精确性以及未预料事件所带来的风险,所以储备资金不用于政策操作。另外,自由党政府还着力于改革债务存量结构,以降低公债利息对利率变动的敏感度,并且努力改进债券市场的效率,以降低政府债务的服务成本。

2. 改革社会福利体系,提高公共支出配置效率

加拿大的社会福利计划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内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庞大体系,由联邦政府对各省和地区的转移支付、失业保险和老年保险所构成。联邦政府对各省及地区的转移支付计划包括有条件的既定计划筹资和加拿大援助计划与无条件的加拿大财政均等化计划和地区固定筹资。联邦政府根据既定计划筹资向各省提供转移支付给付金,主要用于资助健康保险和高等教育;而加拿大援助计划则由联邦政府向各省提供转移支付给付金,再由各省作为“最后的资助者”向那些无法从失业保险、老年保险以及各类公共和私人养老金计划中得到救济金的人给予社会资助。1994年预算宣布,在1995-1996财政年度内将加拿大援助计划下的转移支付额冻结在1994-1995年度的支出水平上,次年对转移支付体系的改革正式出台。既定计划筹资和加拿大援助计划被加拿大社会转移支付所取代。新的转移支付是五年期(1997-1998至2001-2002年度)一次性的财政安排,由现金和税点两部分组成。联邦政府向各省返还约20%到40%不等的税收收入。对一个省来说,若其税收部分总额上升,则联邦政府所返还的现金部分将减少,反之亦然。各省从转移支付改革中得到的好处是各省在转移支付给付金的使用上有更大的自主权。作为无条件的财政均

等化计划,它是降低各省征税能力差距和保证各省具有大体相同的公共服务能力的主要财政手段,因而被视为维系加拿大联邦制的一根重要支柱。由于在此前已作了五年期安排(自1994-1995年度到1998-1999年度),所以这次改革没有触动它,但却触动了地区固定筹资。联邦政府冻结了1995-1996年度对西北和育空两地区的给付金数额,并削减了1996-1997年度对这两个地区支付的给付金。对转移支付体系的改革既出于近期考虑,也考虑到了长远。就近期而言,是为了加速削减财政赤字的进程,让各省和地区也为联邦政府分担一部分减少赤字的义务。仅在1996-1997和1997-1998两个财政年度内因加拿大社会转移支付取代原有两个计划的改革,就使联邦政府减少财政支出70亿加元。就长远而言,是为了控制转移支付支出的总额增幅,提高财政支出的配置效率;同时也是为了结束多年来联邦和各省围绕转移支付操作成本的分担而引发的纠缠不清的难题。

自由党政府认为,现行的失业保险计划削弱了加拿大人的就业能力,尤其不鼓励人们对变动的经济条件作出调节。其结果是许多个人、行业和地区越来越依赖于这一类型的经济来源;与此同时,由于这一计划的筹资成本被加到工薪税上,因此它阻碍企业增加新的就业,特别是不利于企业增加低工资的就业岗位。1993年底自由党政府宣布,在1994年内每100加元的可接受保险的收入的保险费率必须低于3.30加元。随后保险费率进一步逐年调低,从1994年以后由3.07加元降至1998年的2.70加元。对失业保险体制的改革降低了失业保险金支出,仅1994-1995年度就减少支出7.3亿加元,此后每年度平均减少24亿加元。自由党政府力求通过降低工薪税和降低失业保险金比率并强化工作经历同失业救济金之间联系的方式,促使企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激励人们重返工作岗位,鼓励工作绩效。

加拿大的老年保险体系包括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和联邦公共养老津贴,后者由老年保险、有担保的收入补助金和配偶津贴所组成。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是强制性的,要求雇主和雇员双方在工作期内缴纳保险费直至退休。在操作上,该计划遵循的是“边筹款边支付”的原则,即每年所筹集的款项用于当年支付养老津贴。据估算,加拿大养老金计划下的资金将于2015年全部用完。为了使这一计划得以延续,1997年9月自由党政府决定从1997年起直到2003年六年内把雇主和雇员缴纳的保险费率由原来的5.85%提高到9.9%,同时将每年所支付的养老津贴削减近10%,所增加的保险费将被投资于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对联邦公共养老津贴的改革将于2001年实行,届时老年保险、有担保的收入补助金以及其他各种税收减免优惠将合并为一种新的免税的老年津贴。与此配套的是,自由党政府还在1995年预算中宣布,凡在1995年底达到60岁的加拿大人可以作出选择,或是转向新体制,于2001年领取新的老年津贴,或是留在旧体制内,在余生中继续领取按现行方式发放的老年保险津贴和有担保的收入补助金。

3. 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推动经济长期增长

以让·克雷蒂安为首的自由党政府认为,加拿大同世界各国一样正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联邦政府有责任帮助加拿大国民和企业对正在发生的变动作出调节,抓住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为此,自由党政府制定了一个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及人力资本进行战略性大规模投资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首先,扩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自由党就任不久,总理让·克雷蒂安就同各省省长就修建全国性基础设施计划达成协议。第一期工程二年,联邦政府投入20亿加元,各省市投入配套资金60亿加元,用于兴建和维修道路、桥梁、下水道等设施。1997年初第一期工程期满后,联邦政府再次拨出约43亿加元,各省也提供相应资金。这样一来,原计划实施二年的公共工程计划延长到四年。自由党政府推行此计划的目的是,主要是为了兑现竞选时说过增加就业的承诺,同时也是为了更新和修复市政设施。据统计四年内公共工程计划总共提供了约80000人一年的同建筑业有关的就业机会。

其次,促进对新技术的投资。自由党政府认为,加拿大之所以能完成从一个资源禀赋丰盛的生产初级产品的经济到建立在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基础上并跨入西方“七强”之列的发达经济的转变,主要得益于知识和技术。今天当各国都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时,加拿大这个自然资源富庶的国家只有同时也开发知识和技术才能取得成功。基于这一考虑,联邦政府每年将50多亿加元用于同科学技术相关的活动,其中有不少支出用于同私人公司的合作,例如空间技术开发等。联邦政府每年投入研究与开发的经费在全国用于该领域的资金总额中占到21%,每年还用13亿加元以联邦科学研究与实验开发投资税收减免的方式资助私人部门的研究活动。此外,在1996年预算中,联邦政府向加拿大工商开发银行注入5000万加元资金,以此启动追加的3.5亿加元银行贷款,资助小企业和以知识经济为依托的和出口导向的企业。1998-1999财政年度,联邦政府又以2.5亿加元资助私人部门开发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这一资助以基金而不是以赠款方式操作。

再次,加速对人力资本投资。自由党政府在这方面的措施包括在加拿大学生贷款计划之下每年用10亿加元资助新入学大学生作为大学教育期间的预付款,并在1996年另外追加8000万加元资助学生及其家庭克服学费上涨等困难。联邦政府还另外拨出3.15亿加元帮助大学毕业生在正式找到工作之前从事社区服务工作,以积累经历,完成从大学到就业的转变。1997年预算中又提出了通过税制变动来鼓励家长为将来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在已注册教育储蓄计划中增加储蓄的税收减免方案。同年,让·克雷蒂安宣布创立加拿大跨世纪奖励基金以奖励杰出人才,并向中等和低收入加拿大人提供奖学金。自由党政府之所以重视对人力资本投资,除了知识经济挑战这一因素之外,还有对吸引外资的考虑。加拿大就业中的10%以及出口产品的50%直接同外国在加拿大的投资有关。加拿大吸引外资的主要障碍并不在资源禀赋方面,外国高技术公司对加投资作出选址决策时,更多考虑的是熟练劳动力。这一点不仅影响加拿大经济结构,而且对历届政府的政策具有重要影响。

最后, 实行税收减免和增加转移支付。自由党政府在财政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的前提下, 为刺激经济增长, 实行了较大规模的税收减免和增加转移支付给付金。具体措施有 1997 至 2000 年三年内对中低收入者减少总额的 70 亿加元的个人所得税, 取消自 1985 年以来实行的对年收入在 5 万加元以上者所征收的 3% 超额所得税, 在今后 5 年内向各省每年增加 23 亿加元的健康转移支付给付金, 等等。

三

自由党政府执政六年来, 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 对宏观经济进行综合治理, 既注重短期政策效果, 又考虑短期政策与结构性改革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 有计划、分步骤、讲策略地推行既定政策, 不仅使财政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而且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降低了失业率, 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经常帐户, 缓解了加元的压力。加拿大经济这几年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IMF 有关机构给予了高度评价, OECD 也向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推荐并建议采纳加拿大政府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在 1997 年全国选举中, 自由党再度当选, 开始了它的第二个任期。该党在经济政策上的成功无疑是其连选连任的主要原因。

1. 财政状况的历史性转变

卸去了财政赤字的沉重负担, 把加拿大转变为一个拥有财政盈利的国家, 这是自由党政府执政六年来最重要的成就。1997 年 OECD 将加拿大列为“七强”中财政绩效最佳的国家。及 1997-1998 财政年度, 联邦政府实现了 35 亿加元的财政盈余。这是自 1969-1970 财政年度以来 28 年里第一次出现没有赤字且有盈余的年份。联邦政府 1996 年曾宣布, 截止 1998-1999 年度, 赤字减少至 90 亿加元, 后又作修正, 承诺最迟不晚于 1998-1999 年度平衡财政预算, 但削减赤字的实际进程超出了联邦政府的预期。1994-1995 年度预算赤字额为 397 亿加元, 但赤字实际减少至 375 亿加元, 比预算多减少 22 亿加元; 1995-1996 年度预算赤字为 327 亿加元, 但最终赤字降为 286 亿加元; 1996-1997 年度的最终赤字仅 196 亿, 比目标赤字多减少 53 亿。正因为每个财政年度都超额完成减少赤字的目标, 所以, 自由党政府提前一年于 1997-1998 年度实现了平衡预算, 而且获得了财政盈余。截至 1998 年底联邦政府财政盈余达 104 亿加元。省级政府财政也已经步入良性循环, 10 省 2 地区的赤字总额由 1992-1993 年度的 250 亿加元下降为 1997-1998 年度的 34 亿加元。目前已有 5 省 1 地区达到了预算平衡甚至还有盈余。省地政府计划在 2000-2001 财政年度完全实现平衡。随着联邦政府卸去了财政赤字负担, 其公债持续上升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1997-1998 年度联邦政府偿还了 96 亿加元的债务。自 1969-1970 财政年度以来联邦政府第一次有能力偿债。这一年度内公债对 GDP 比率降为 67.8%, 实现了距 1956-1957 年度以来 3.3% 的最大比率的降幅。联邦政府宣布, 不再到私人信贷市场去借款。在 1998 年底出现 104 亿加元盈余前提下, 1999 年预算计划将 30 亿加元留作应急储备金, 另外 30 亿加元用于清偿债务, 余下部分作为政策操作之用。

2. 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1993 年至 1997 年五年间加拿大实际 GDP 平均增长 2.7%, 其中 1994 年和 1997 年分别达到 3.9% 和 3.8%, 1998 年实际增长率仍达到 3%。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上升, 加拿大生产率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多要素生产率在 1997 年升幅为 2.8%, 不仅高于美国, 而且高于“七强”平均水平;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同年也达到 2.9%, 明显超过美国。十年来这两个指标第一次超过美国。经济增长加速, 加拿大人实际收入随之增加, 政府财政收入随之扩大。据统计, 1994 至 1998 年四年内, 联邦政府所增加的 372 亿加元的财政收入中约 310 亿加元是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对刺激增长尤其是对刺激投资起了重要作用。联邦政府同中央银行密切配合, 确立了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1%~3% 升幅的目标。这一做法使投资者们确信, 货币当局承担了在经济扩张期内控制成本与价格压力的义务。另一方面加拿大银行注意随时调整利率, 使之与联邦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相吻合。1994 年当加拿大利率高出美国一个百分点, 加拿大银行在 17 个月内 17 次降低利率, 硬是将利率调到低于美国的水准上。低利率与联邦政府财政状况明显改善, 再加上从 1996 至 1998 连续三年通货膨胀率平均低于 2%, 极大地刺激工商界增加投资。仅在 1996 年下半年至 1997 年上半年间, 企业对机器设备投资增长 25%。自 1993 年以来加拿大固定投资增长在“七强”中居第二位, 仅次于美国。

3. 失业率的显著下降

加拿大的失业率由 1993 年的 11.4% 降为 1998 年的 8.3%, 抵八年来的最低水平。从 1993 至 1998 年五年间加拿大总共创造 130 多万个就业岗位, 年增每年就业增长 1.7%。以就业增长速度而言, 加拿大居“七强”中第二位, 次于美国; 就失业率下降速度而言, 加拿大仅次于英国。事实上这几年里加拿大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比德、法、英、意四国相加总和还要多。

尽管自由党政府登台以来推行的经济政策在某些领域收到了显著成效, 但在另一些领域却成效不大。从目前看, 影响加拿大经济前景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项:

首先, 公债规模。加拿大目前公债总额为 5797 亿加元, 公债对 GDP 比率仍达 67.8%, 在“七强”中居第二位。按联邦政府 1997-1998 年度确立的偿债计划, 公债对 GDP 比率将在五年内下滑至 55%, 即每年下降 2 个百分点。按此速度计算, 假设不发生经济衰退等未预料事件, 距今算起直至债务偿清至少也需 31 年。如此大规模的公债, 需如此漫长的时期才能偿清。这犹如一把久悬在联邦政府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其前景难容乐观。前任马尔罗尼政府也曾使联邦政府赤字大大削减, 所不同的是, 前任一方面大举征税, 同时又无法扼制公债的持续攀升, 当 1990-1991 年经济衰退到来时却全然束手无策, 到头来不仅未能减少赤字, 同时也酿成了巨额公债的苦果。自由党政府会不会重蹈覆辙? 目前尚难以预料。同公债规模相关的是债务利息和利率。目前在每一加元税收中有 27 加分用于支付公债利息, 公债利息支出占到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 2/3 以上; 而巨额的公债规模倾向于推动利率上升, 这势必阻抑投资

者的信心。所以说，公债规模以及与此关联的债务利息及利率在相当的时期内仍将是影响自由党政府及其绩效的重要因素。

其次，美国经济的带动作用。由于历史和地缘上形成的同美国的特殊联系，加拿大在经济上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自由党执政以来的六年里可以明显看出美国经济对加拿大经济的深刻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同亚洲有贸易紧密联系的西部省份受到强烈冲击，而1997年美国经济的强劲扩张带动了加拿大经济，使之部分地抵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1998年的春夏之交，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工人大罢工，导致加拿大第二、三季度GDP分别下降0.3%与0.6%，但随着下半年美国经济再度扩张而增加从加拿大进口，致使第四季度GDP猛增4.6%。近期内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利率的牵动效应。目前美国宏观经济运行正接近达到生产潜力水平，一旦抵达这一水平时，美国的通货膨胀将趋于上升，联储将提高利率，由此产生的溢出效应又将带动加拿大利率上升，进而对加拿大经济施加全面的影响。

最后，经常帐户状况和加元地位。自1993年以来，加拿大实际贸易余额达到190亿加元，导致1996年第二季度出现了占GDP0.6%的经常帐户盈余。这里自1984年以来首次出现盈余。目前虽然经常帐户仍有赤字，但其规模远低于90年代初。加拿大多年来依赖外国资本弥补其经常帐户赤字，但随着财政状况明显改善，联邦政府不再向国外举债，这无疑有助于巩固

经常帐户地位。加元长期疲软的状况自自由党任期以来没有根本改变。1997年世界范围内商品价格猛跌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元相对于加元更趋坚挺，加元惨跌至1加元兑换63.31美分的创纪录低点。从近期看，虽然加拿大经常帐户趋于改善，但其他因素如公债规模、投资者信心、同加拿大商品出口相联系的贸易条件，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政策等仍将对加元币值保持重要影响。因此，加元疲软的状况在近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将继续对未来的加拿大宏观经济运行施加影响。

注释:

- Canadian News Facts, May 16- May 31,1993, pp.47,55 .
Government of Canada, News Release, Oct. 9,1996, pp.2.
Canadian Newstacts, April 16- April 30,1997, pp.5486.
Department of Finance, Canada, The Economic and Fiscal Update, Oct. 15,1997, pp.35.
Department of Finance, Canada, The Economic and Fiscal Update, Oct. 14,1988, pp.51.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林 玲)

(上接第103页)性工时制的劳动力市场，职工并非全部工时就业，而是有选择有时段间隔地就业，即实行部分工时就业。这样数量一定的就业岗位就被分割为数倍于原岗位的量。若假定原有就业岗位 m 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有 n 个，在存在失业的情况下， $n > m$ ，以每天8小时工作量计，在实行弹性工时制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以每人每项工作 t 小时计，则可增加的就业岗位为：

$$\left[\left(\frac{8}{t} - 1 \right) \right] \times m$$

显然，当 t 取4时，新增的就业岗位数比原来的将翻一番，令 $\left[\left(\frac{8}{t} - 1 \right) \right] = A$ ，笔者称 A 为“部分工时乘数”，该乘数与现行弹性劳动力市场的人均每天每项工作的时间长短有关，工作时间越短，新增的就业岗位越多，反之就越少。对于人均每天每项工作的时间长短的确定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考虑：由于 $t < 8$ ，则 $\left[\left(\frac{8}{t} - 1 \right) \right] > 0$ ，当 $n = \left[\left(\frac{8}{t} - 1 \right) \right] \times m + m$ 时，市场达到均衡，

$$\text{此时 } 8m = tn$$

$$\text{即 } t = \frac{8m}{n}$$

即每人每天每项工作时间为 $8m/n$ 时，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此时就可消除非自愿失业。

其次，从劳动者个人效用最大化考虑：假定劳动者个人效用由工资效用和闲暇效用构成，其中工资效用包括其多个部分工时工作所带来的报酬，用 Y_1 、 Y_2 、 Y_3 表示（假定部分工时以3项为宜），闲暇效用用 U 表示，它们均表示为时间 t 的函

数， $Y_1 = Y_1(t_1)$ 、 $Y_2 = Y_2(t_2)$ 、 $Y_3 = Y_3(t_3)$ 、 $U = U(t_4)$ ，职工的时间满足如下表达式： $t = t_1 + t_2 + t_3 + t_4 = 24$ ，职工效用函数表示为 $W = U(t_4) + Y_1(t_1) + Y_2(t_2) + Y_3(t_3)$ 。职工为了使其效用最大化，就必须对其时间进行合理的配置，运用拉格朗日函数，求极值。

当 $\frac{\partial W}{\partial t} = 0$ 时，其效用最大化，

$$\text{即 } \frac{\partial [Y_1(t_1) + Y_2(t_2) + Y_3(t_3) + U(t_4)]}{\partial t} = 0$$

那么当 $\frac{\partial Y_1}{\partial t_1} = \frac{\partial Y_2}{\partial t_2} = \frac{\partial Y_3}{\partial t_3} = \frac{\partial U}{\partial t_4}$ 时

职工的效用达到最大，具体而言就是该职工的时间配置满足：三部分工时工作的边际净收入效用等于闲暇的边际效用，他所得到的效用满足程度最大，此时，职工必定要按约束条件所要求的时间 t_1 、 t_2 、 t_3 、 t_4 来合理地配置自己的时间。

四、结语

弹性工时的制度化其实就是我国逐步解决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在当前妥善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以及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时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使人力资源的配置市场化，并辅之以制度创新配套，来积极推行弹性工时制，这必将对我国的经济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经济系 杭州 310027)
(责任编辑: 向运华)